

XINANLIANDADESIFENKESIZHIMI

西南联大的 斯芬克司之谜

大联大

杨立德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西南联大的 斯芬克司之谜



杨立德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南联大的斯芬克斯之谜/杨立德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5

ISBN 7-222-04398-5

I. 西... II. 杨... III.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校管理—经验 IV. G649.28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0322 号

责任编辑: 张旭

装帧设计: 胡元青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西南联大的斯芬克斯之谜
作 者	杨立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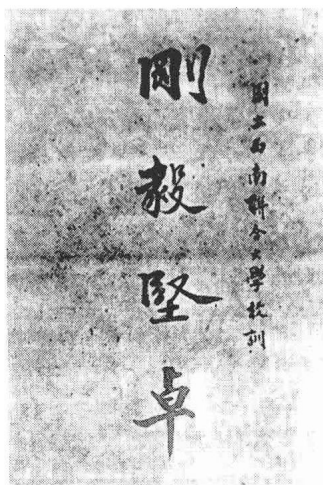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m.peoplespace.net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360 千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000
排 版	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朗明印务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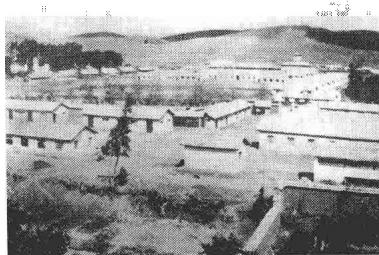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222-04398-5
定 价	29.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西南联大校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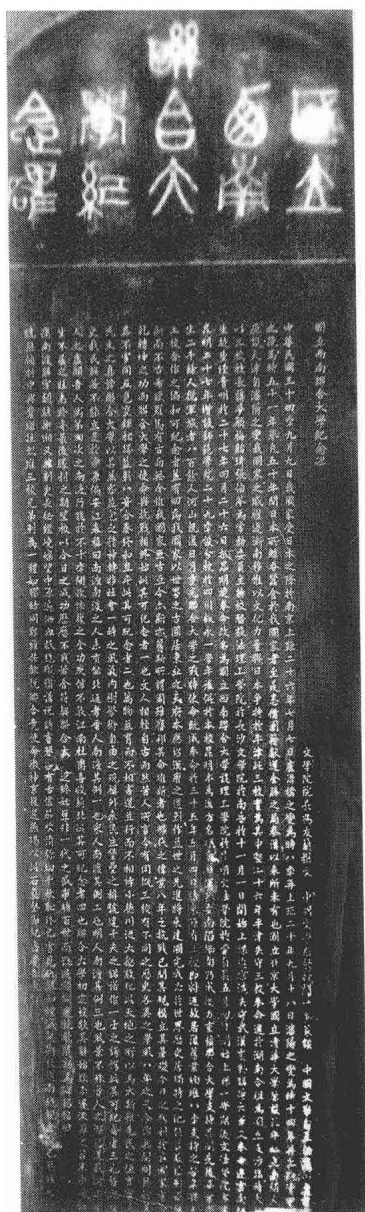


学校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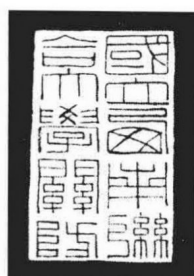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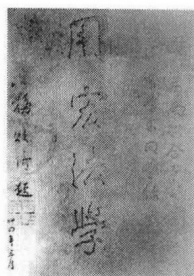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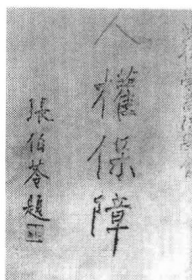
新校舍南区全景

这是冯友兰教授撰文、闻一多教授篆额、罗庸教授书丹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阳面





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 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 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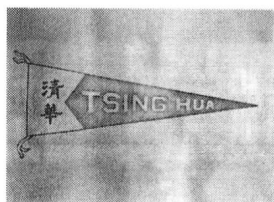


张伯苓题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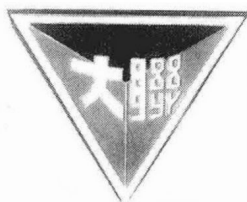
梅贻琦题辞

蒋梦麟题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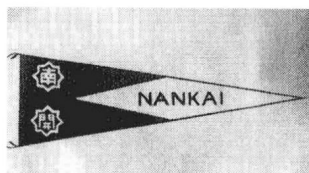
西南联大国防



清华大学校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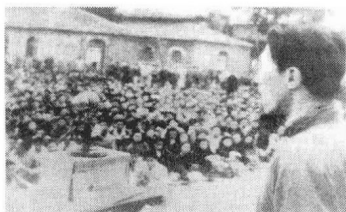
西南联大校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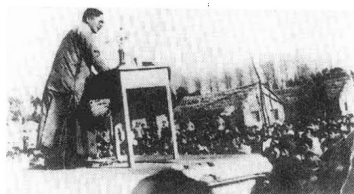
南开大学校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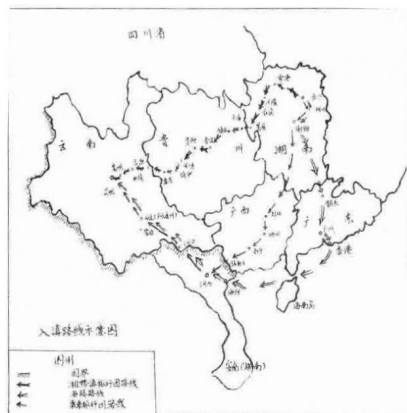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校旗



闻一多教授在演讲



吴哈教授在演讲



长沙临大师生三路入滇示意图



西郊陈家营教授宿舍



理科教师的部分著作



西郊大河坝村教授宿舍



文科教师的部分著作



四烈士像：潘琰



于 冉



张华昌



李鲁迭



西南联大的“民主墙”



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全体师生合影



西南联大四年级二级毕业社会系一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大在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这是梅贻琦在会上讲话，宣布西南联大结束

目 录

“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代前言）	1
西南联大在国际上的意义	7
西南联大：国内一流大学的楷模	26
大学制度与办学成败	43
“和而不同”与西南联大的“联合”	60
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	79
《大学一解》：西南联大的办学宣言	92
中华“和合”文化与“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	113
大学与世界教育理念	126
真理在争论中产生	136
“位育”的真谛与意义	155
学分制与选课制	178
教书和育人	196
教师素质与教书育人	214
重熏陶而不重管理	228
“官本位”：学术发展的大敌	248
学术：大学的生命	261
“大学也者，研究学问之机关”	275
教学与学生成才	285
学校教育与社会需要	297
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	311
“党化教育”的日趋没落	320

学校设施为学生成才服务	332
西南联大的素质教育	351
教授的地位与作用	374
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	386
学术研究与教学质量	407
敬业精神的力量	424
“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	437
实话实说（代后记）	454

“中邦三十载 西土一千年”

(代前言)



西南联大是一所与抗日战争相始终的大学。芦沟桥事变起，北平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奉教育部令，先在长沙设立临时大学，称为“国立长沙临时

大学”；后南京失陷，长沙危急，又奉最高国防委员会命令，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其使命完成，于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西南联大从1938年在昆明建校算起，共办学8年，注册人数达8000余人。就在西南联大在昆建校第四年，恰逢清华大学建校四十周年，又是梅贻琦担任校长十周年，国外许多大学纷纷发来贺电，其中英美国家大学电文中有“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之说。这个意思是说，西方大学从中世纪诞生至现代大学制度建立，才出现一流大学，经历了一千年之久，而中国从清末的京师大学堂算起，到西南联大不过三十余年时间，这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另外，西南联大创造的另一奇迹是，一方面是教学条件极端艰苦，经费奇缺，校舍简陋，图书不足，仪器缺乏；另一方面却是一流人才大量涌现，形成了让人百思不解的“SPHINX(斯芬克司)之谜”。所谓一流人才大量涌现，包括：(1)培养了两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时至今日，中国也只有两所大学获此殊荣，一所是台湾大学，另一所就是西南联大。(2)199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23位为中国“两弹一星”作出杰出贡献的专家，其中就有8位是西南联大的师生。他们是：邓稼先、朱光亚、赵九章、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杨嘉墀和屠守锷，尚不包括叶企孙、周培源、王竹溪、赵忠尧、马大猷等著名的物理学家在内。(3)1948年，当时的中国中央研究院公布了81名院士，西南联大有25名，占32·4%。此外，1955年中国科学院公布了470名学部委员(院士)，西南联大师生有118名，占39·8%。(4)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及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如黄宏嘉、王宪钟、吴仲华、唐敖庆、郝诒纯、朱德熙、任继愈、王浩、曹安乐、汪曾祺、穆旦……等等。(5)它培养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彭佩云，教育部副部长何东昌；培养了一二·一运动中的潘琰、李鲁连两位烈士；培养了牺牲在中美合

作所的烈士刘国志(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6)200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受表彰的刘东生院士,是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学生。在此之前表彰的黄昆,也是西南联大学生;吴文俊虽然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但他的导师却是在西南联大工作过的陈省身先生。(7)大批学生参军参战,一些学生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西南联大纪念碑后面“从军同学题名”,开头的五位在名下注有“殉职”二字,表明在当时就已经牺牲了。

这所大学仅仅存在八年,而且结束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但它的价值、它的精神、它的传统,却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也是一笔极其重要的无形资产。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培养了大批人才,为抗战建国提供了人才支撑,还在于全面推动了云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经济为例,“自联合大学南来,集诸科多数之专家,得悠长之岁月,或以修志躬莅其地,或受委托精研其事,其结集者已不少成书,其待编行者方层出而不穷。凡兹所为,均可谓知类通方,开物成务,有关国计民生之大者。于是滇之为滇,始一扫阴霾,以真面目显示于天下,后有董理开发之者,其必以是为借镜矣!”^①以教育为例,西南联大的学生毕业后自办的私立中学,就达22所之多,这就让云南的青年们有更多的求学机会。值得一说的是,西南联大到云南,是抱着开发的目的来的。学校常委梅贻琦1938年一到昆明就向记者发表谈话,明确表示:“滇省环境优良,从事开发大有可为。”因此,西南联大的教师们都把开发云南作为自己的自觉行动。联大研究院地质学部在给学校的呈文中说:“自学校南迁,虽图书仪器尽失,而系中同人研究精神不减当年,因地制宜

^①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一卷第286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对西南各省地质、地层、矿产、地质构造、矿物岩石等饶有兴趣而愿切实研究”。社会学系的报告中也说：“滇黔民族种类繁多，生活习俗与汉人迥异。在民族文献中尚无详尽之叙述，如能加以系统之调查，对于民族学之贡献当非浅鲜。”农业研究所病虫害组的报告中说：“本组为欲明云南省全省之虫害情形，故进行虫害调查。照拟定计划，以昆明为中心点，依滇越铁路线，南至滇越边境；依昆嵩公路线，东北至会泽寻甸；依昆平公路线，东至曲靖平彝宣威各县；依滇西公路线，西北至迤西各县；由石屏或玉溪，西南至车佛南各县；沿滇缅公路线，至西部各县。此不啻构成数条横穿全省之直线，则依此数条直线调查之结果，可以见全省虫害之大概情形。”于是，他们跋山涉水，餐风露宿，对全省进行了全面考察，结合考察进行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学的职能就是积累知识、传授知识、创新知识，就西南联大而言，在昆八年之中，学校开出了1600门课程。有的课程是结合抗战开出的，如“堡垒工程”、“军事桥梁”、“给水工程”、“卫生工程”等。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兼容并包的精神。一校之中，学术林立，派别繁多，“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从而使西南联大出现了“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为培养一流人才创造了优良的条件。

“教师的责任是转移社会风气”，这是西南联大教师的共识。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说：“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西南联大的绝大多数教师是在五四运动后出国留学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通晓古今，融汇中西，道德文章都堪称一流。他们既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特点，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

不能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又有西方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历史责任感，并将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形成西南联大特有的爱国、科学、民主的优良传统，给全国的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对此，社会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自联合大学南来，亲见其蒙艰难，贞锲而弗舍，举亨困、夷险、祸福，胥不能夺其志。因推阐其本末一贯之理，知夫施诸治学，则为一空依傍，实事求是；见诸行事，则为知耻适义，独立无惧；反之于身，则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推之于人，则为直道而行，爱之以德。盖析之则为个人之品格，合之则为一校之学风，其不志温饱，特全德表著之一端耳。”要转移社会风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例如，当时国民政府颁布《抗战建国纲领》以后，其中主张的“通专才”并重(实际是主张专才教育)、“提倡理工，抑制文法”，就受到西南联大师生的抵制和批判，认为大学应该顾到百年大计，不应该为一时的偏倚而变质。批评国民政府的做法是一种“目光短视的行为”；为此，学校上书蒋介石和教育部长陈立夫，要求政府“泯除学院之别”，“防止青年轻视纯粹科学、精神科学”。不仅如此，在实践中，西南联大自己走出了一条通才教育、平时教育与战时教育相结合的道路，培养了大批人才。此外，西南联大的教师作为知识分子，在鼓动民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化学系教授曾昭抡为例，在战争爆发不久，前方传来日寇使用毒气的消息，这消息一度在后方引起了恐慌。曾昭抡教授针对这种情况，多次在报上发表文章，既破除毒气法宝的神话，又普及了科学知识，使人心大为安定。他还在报上撰文《国难期间科学界同人应负的责任》，文中提出，科学界同人应继续在专门工作上加倍地努力，同时要积极训练人才。他说：“我们能有少数科学家，苦心孤诣地做一点较好的专门工作，替国家争一点名誉，固然也是一件好事。但

是我们目前最需要的，是要有较多受过科学训练的人，这样在平时可以使各种建设事业加速地进行，在战时也不致因为一部分人为国牺牲而受重大影响。”他还提出：“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也是国民的一分子，应该自告奋勇地担负起一般国民应尽的义务。将来有了报国的机会时，我们应该赶快地投笔从戎。只有我们大家拿碧血来贡献国家，我们的民族才不致做敌人的奴隶。世界上任何重大的科学贡献，它的价值都不能超过殉国。我很愿意把这点用来勉励同人，并且自勉。”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大的贡献就是唤起民族自信心。教师们克服困难，努力著书立说，把唤起民族自信心作为自己应尽的义务。他们还与北平研究院合作，成立“中日战事史料征集委员会”，广泛收集与抗战有关的史料，为后人研究这场战争提供方便，也为抗战胜利后的远东国际法庭做好资料准备。

大学是地方的文化中心。“一地方之有大学，犹一校之有教师也”，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中，充分发挥了大学的作用，为抗战建国以及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蜚声国内外。美国、日本都有人在研究它，不仅研究它的成绩，也研究它的办学经验，为今天办好大学所借鉴。

西南联大在国际上的意义

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环境下，所作出的成绩，远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所说的“可纪念者盖有四焉”那四点，因为立纪念碑之时，仅是1946年，其成绩的显现却延续至今并影响到以后。也正因为它的成绩，或者说是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迹，使得它具有极重要的国际意义。进入新世纪后，在中国以科学和教育振兴国家的关键时期，人类即将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我们再来认识西南联大在国际上的意义，不仅有了基础，而且更有必要。

第一，它充分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时的崇高气节。

大学，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群体。中国大学的知识分子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培养，形成与外国大学知识分子的不同之点，就是十分看重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特别是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这种气节更加凸显出来。在西南联大这所因抗日战争而组合在一起的大学里，它表现在誓死不当亡国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及为抗战建国培养人才上。

芦沟桥事变以后，北平天津相继失陷于日寇之手，南开大学被日军炮火夷为平地。面对断壁残垣，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说：“被摧毁者是南开的物质，而摧毁不了的是南开的精神。”也

就在此时，著名文史大师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为抗议日寇的入侵，忧愤绝食而死，陈寅恪挥泪南下执教。著名生物学家李继侗写信给家人时则表示：“抗战连连失利，国家生死未卜，倘若国破，将以身殉”。这不禁使人想起都德的著名小说《最后一课》，其最后一句是：“放学了，同学们，你们走吧！”然而，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的教师却没有让学生“散学”，而是先南下长沙，后西迁昆明，坚持弦歌不辍，为的就是不当亡国奴，为的是中华民族的振兴。在长沙，开学不足一月，日寇的飞机就对长沙狂轰滥炸，迫使“长沙临大”再度迁徙。在西迁昆明的时候，师生分三路入昆，其中约 250 名学生和 11 位老师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更是在中外教育史上创造了奇迹。在 11 位老师中，还包括闻一多、李继侗、袁复礼、曾昭抡、黄钰生 5 位教授。这些师生除短途乘船乘车外，几乎是用双脚横跨湘黔滇三省。他们跋山涉水，沐风栉雨，渡盘江，越高山，历时 68 天，行程 3500 华里，完成了中外教育史上罕见的文化大迁徙，使较为先进的北方文化进入了封闭落后的云南。人们很难想象，这些身着长衫、戴着眼镜、瘦削文弱的知识分子，怎么会有如此亢奋的精神，支持他们克服艰难险阻，支持他们到抗战的大后方办教育。如果说“湘黔滇旅行团”是“群体行为”的话，那么还有作为个人的例子，那就是后来为闻一多先生写“金石润例”的浦江清先生。他按规定休假一年赴上海，不料假期将满，越南已被日军占领，切断了他返回西南联大的归路。不久，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为了不负西南联大的聘约，他不顾关山阻隔和胃病疟疾的折磨，毫不动摇，只身向西，穿越日军封锁线，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进入昆明，行程 8000 余里，历时 177 天，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啊！遗憾的是浦江清的此行却鲜为人知，并没有产生轰动效应，但是，此举也折射出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的崇高使命感。“湘黔滇旅行团”的照片，通